

中性与中国符号学思想史^①

田沐禾¹ 孟华²

(1.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5)

摘要:本文中的“中国符号学思想”,是将其放在外部的中西符号学和内部的古今符号学对比的关系中来思考的,并紧紧围绕符号学的“中性”即“异质符号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或跨界”这个根本问题,展开对中国符号学思想发展与现状的讨论。无论是对传统周易符号、汉字符号中语象融合精神的发掘,还是当代中国符号学代表人物在处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关系时的中性立场,都体现了中国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中性化趋势。

关键词:中性;中国符号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4-0031-09

0 引言

“中性”被巴特称之为“破除聚合关系之物……即通过一个第三项……,甩掉、消除或反制聚合关系的僵硬的二分法”(罗兰·巴尔特,2010:10-11)。汉语中有大量二元聚合单位失去对立性而“中性”化:如“窗户”中的“户”失去对立;如“不知深浅”中的“深”和“浅”失去对立;如“像米粒那么大(“大”也可改为“小”)”中的大与小失去对立。与“中性”相对的是“极性”的符号概念,即二元对立:其基本原则是,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的区别或对立,符号意义就产生于这种区别对立中。

巴特的“中性”是一个同质概念,孟华将“中性”改造为“异质符号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或跨界”。这个异质符号(主要指语/象)之间的“中性”关系,成为他描述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和中国当代符号学思想的关键词。

1 “周易”的中性符号学思想

广义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是古代卜筮活动的底本,不仅是对更早期的占筮活动的记录和解释,而且也是周代人们占筮或决疑活动的“应用指南”。《左传》《国语》中就有许多根据《易经》判断凶吉的例子。由于《易经》成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演变,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于是便出现了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朱伯崑(1993:代前言)认为,《周易》这部典籍从其形成到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易经》《易传》和历代易学,此三者构成了对更早的卜筮符号活动的解释系统。这就构成了一个由“筮、经、传、学”四者既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的“周易”符号谱系。本文使用带引号的“周易”,来表述这个广义的符号系统。

收稿日期:2022-05-11

作者简介:田沐禾,女,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字符号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孟华,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字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文字符号和视觉图像符号的关系研究。

①本文是第一作者对孟华主撰的《中国符号学思想》(王铭玉主编《符号学思想论》第四章)之中性符号学思想史的进一步阐发和综述。

引用格式:田沐禾,孟华. 中性与中国符号学思想史[J]. 外国语文,2022(4):31-39.

“周易”符号系统的“中性”表现为,它超越异质符号的边界而成为一个语象融合体。

从历时生成看,“周易”符号系统叠加了“筮、经、传、学”四套异质符号系统。“筮”代表动态的卜筮符号,“经”即《易经》包括卦爻象和经文(卦爻辞),“传”即《易传》,“学”即历代易学,是对前三符号要素的阐释研究文本。因此,“周易”符号谱系中包含了仪式的(或话语的)、图像的、书写的等各种异质符号,它们被“立象以尽意”的象喻性方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层累的、中性的、超符号谱系,用来有理据地表征背后的世间万物及其义理。

从共时结构分析看,“周易”符号系统的每个要素都具有异质中性、语象融合的特征。

1.1 占筮符号

占筮性仪式中的象数符号——由基于数变(如奇数还是偶数)的蓍草而构成的卦象^①,具有中性符号特征: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边界的消除。象数之象一开始便具有图像符号的空间模仿和文字符号的时间造意双重属性,但又不是纯粹的图像或文字,学术界一般使用“意象”或“象”来描述易数之象的中性特征。

1.2 《易经》符号

《易经》是一个语象兼有的“中性”符号文本,而不是纯线性书写文本。《易经》主要包括两类符号:卦爻象(八卦、六十四卦的卦爻象)与书写符号(卦爻辞)。卦爻象以象征性图形的方式保留了仪式时代卜筮符号的精髓,卦爻辞则是书写符号对卦爻象主导的卜筮符号的补充和意义阐释。二者复合成为一个更大的中性符号系统:卦爻象有了卦爻辞的介入而本身成为一种非显象性的观念化操作系统;卦爻辞是以观象而非阅读为目的的写作,也具有显象性写作特征。但是卦爻辞成为指导人们占筮活动的文字指南时,它又是作为相对独立的书写性、阅读性文本来使用的。整个《易经》符号系统包括了表意性的卦爻象、显象性的卦爻辞的中性化关联和过渡。

1.3 《易传》、易学对“周易”中性符号学思想的总结

《易传·系辞上》提出了“立象尽意”的语象融合的符号学思想,即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话可理解为:可以通过“象”符号的“剩余”来补偿语言意义抽象的局限,可以通过书写的卦爻辞的“剩余”来补偿有声言语符号稍纵即逝的局限。《易传》中包含着丰富的语象通融互动的中性符号思想,魏晋王弼将其总结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2011:82)

王弼乃至整个易学的语象通融理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1)“立象以尽意”“尽意莫若象”“得意而忘象”;(2)“尽象莫若言”“得象而忘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可将其翻译为现代符号学语言:(1)用可视、可感、有理据的“象”去表达言与意,同时又随时忘记或隐藏这种视觉理据;(2)用可思、可说、可读的“言”去建构和理解视觉的象,同时又随时丢弃或隐藏用来建构象的言和意。这是中国早期中性符号学思想的精髓。

2 说文学及汉字“六书”研究中的中性符号学思想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问世后,中国学术进入到对汉字进行全方位的形、音、义分析和综合研究阶段,逐渐形成了以《说文》为中心和依托的学问即说文学,清代又往往称之为“许学”。在唐

① 周人占筮通常是用蓍草来进行的,他们把蓍草看成是“天生神物”,是沟通人神的媒介。八卦图像符号就是据揲蓍草成数以定象的象数之法形成的。

代就有了“说文之学”的称呼,宋元明时期以“六书”为核心的说文学逐渐形成、发展,到了清代说文学成熟并达到顶峰。

《说文》是以字形分析为主兼顾音、义分析,通过说解字形,结合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来探求文字的本义。而其字形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六书^①,因此,说文学的核心即六书。汉字的“六书”理论实际上是字形与义(或音)之间的六种关系,相当于符号学中的六种意指方式,因此,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包含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学思想。其中的“象形、指事、会意”,都注重以视觉形象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语言词语,更突出汉字“象”的符号特征。六书中的“假借”则切断了字与词之间的视觉理据联系,借用一个现成的同音字来转写与其意义无关的另一个词,体现了表音即向语言符号靠拢的倾向,更具有“语”的符号特征。六书中的“形声”,其形旁主象,声旁主语,体现了语象融合的中性特征。

唐兰为了突破传统六书窠臼,建立汉字构造新理论,他在1935年写的《古文字学导论》和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将六书概括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象形”即形义完全一致的象形字;“象意”则是形义相关但不一致的表意字(唐兰,2001:66-67);所谓的“形声”,主要指给象意字加声符的方法产生的形声字。唐兰三书说最有价值的思想是紧密契合汉字形音义结合体的性质,概括出“形、意、声”三书。这揭示了汉字语象融合的中性符号性质:“形”接近图像的符号,“声”接近语言的符号,“意”则是介于形和声中间的中性符号。“形意声”或人们常说的“形音义”实际上揭示了汉字在图像、文字、语言三种符号之间摆渡的中性或超符号性质(孟华,2021:15-22)。石虎则称之为汉字的“亚文字”性(石虎,2022:2),这也是汉字六书的语象中性融合原则所产生的迥异于西方字母符号的独特符号形态。

孟华运用符号学原理,突出了传统的“六书”的造字(动态发生考察)而非构字(静态结构分析)的思想,将六书看作是汉字的生产和运行的动态机制,并进一步改造为“两书”:象声和象意。象意方式即用含有视觉理据意义的汉字形体来表现汉语单位的意义。传统上的单纯表意字如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就是用象意的方式构成的,汉字形体的理据义与汉语的词汇义之间主要是通过“象意”的手法联系起来的。如“鸣”字是以鸟嘴喻指动作,“射”字以手和弓箭的合成喻指动作,“牢”画牛以为衬托等等。象声大致相当于六书中的假借,它利用已有的文字去记录新的语言单位,使本字与假借字之间形成一种语音联想关系。至于形声,只不过是象声和象意两书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汉字最基础的功能性表达手段只有“表意”(象意)和“假借”(象声)两书。在传统“六书”理论中,假借仅是一种用字之法,而在“两书”理论中,假借却是整个汉字系统运作的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性手段之一:象声(假借)代表了汉字系统中的任意性方式,象意代表了动机性或理据性方式;象声和象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互动、互渗的中性语象关系。或者说,由象意和象声构成的两书论,是根据符号学的视觉理据和语言任意性两种表达原则而总结出的语象融合的中性符号学思想。

3 西方符号学语象分治的理论传统

中性的语象融合意味着一个符号表达单位具有语象相互跨界的双重编码性质。它的对立面是语象分治,即一种坚守符号纯正边界的极性思维。索绪尔(Saussure)是语言中心主义的符号学立场。他坚持

① “六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保氏》,但没有具体说明。汉代郑众以为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以为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但郑、班都没有具体解释。《说文》对六书的解释是唯一最早的解释。六书学是以许慎的研究为形成标志的,许慎对六书分别给出了界说和例字: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将任意性和时间线条性的语言性质作为符号的本质特征,而排斥了视觉性、理据性的象符研究。西方符号学的另一奠基人皮尔斯(Peirce)也是持语象分治立场的。他的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的三分法就是为异质符号划界。其中的像似符和指示符更接近视觉性的象符,规约符则具有语言符号的性质。当然,皮尔斯并不否认一个符号同时可以具有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这些异质性编码,但他的重点是在区分语象关系,而非关注三者之间的融汇、跨界、互补的中性关系。

西方的符号学史上也有语象融合的中性传统,西方文论中用“语象叙事”(ekphrasis/ecphrasis)(王安等,2019:8)^①一词表示,其基本含义是语象跨界融合。语象叙事的传统源自古希腊罗马,两千多年来其内涵经历了诗如画、以言及象、语象竞争的变化(王安等,2019:4),但其语象融合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但是,若将中西语象融合的符号学思想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在诗歌中营造画面感是语象融合叙事的核心问题,东西方都有这种叙事传统。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王安等,2019:4-5):中国文论叫作比兴,西方叫作隐喻,即一个画面(形象叙事中的喻体或比兴)和一个本体(语言叙事下的对象、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符号学家胡壮麟先生就肯定了龙必锟提出的“像间距”的概念: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距离感(胡壮麟,2004:222)。诗论中“像间距”的概念隐含了语象中性关系的两种方式:执中型——像间距的缩小;移心型——像间距的扩大。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中别离场景(本体,语言叙事)与杨柳依依(喻体,形象叙事)之间水乳交融的执中关系,是像间距的缩小;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面庞与花瓣之间,则具有鲜明的像间距扩大的张力感即移心关系。加拿大学者高辛勇也讨论了像间距的东西方差异,认为中国诗里强调的是“兴”而不是比喻。在比喻的情形下,喻体和本体的距离感是明显的,但“在兴的情形下,两者关系则不明显也不明确”(高辛勇,1997:68)。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在洲的兴象与男女恋爱的语言叙事之间相互烘托、会意、距离感缩小,“兴所涉及的两个意象或事物……强调的是两者有‘类同’的地方”,“而不在于它们之间的断裂和距离”;西方的比喻则“强调喻依和喻体之间的距离”(孟华,1996:70)。由此可见,西方的语象融合符号通常保持了语象跨界的差异感,在跨界的同时又呈现出跨界的痕迹,此为移心型语象中性关系;而中国的语象融合则在跨界的同时抹去了跨界的痕迹,此为执中型语象中性关系。移心型和执中型的差异仍然体现了西方异质对立思维和中国异质融合思维的分别。

4 现代中国的中性符号学研究

中国现代符号学一般认为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起步,至今不过30多年历史,“我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王铭玉,2004:484)。其中如何处理索绪尔代表的形式论符号学和皮尔斯代表的实体论符号学之间的关系,成为认识中国现代符号学史的基本线索。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有四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分别是李幼蒸、胡壮麟、赵毅衡和王铭玉。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粗分为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今这两个阶段。本文重点通过李幼蒸、赵毅衡和王铭玉的理论著作,来考察30多年来中国现代符号学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个基本走向可总结为:形式论与实体论符号学由分治走向合治、由对立走向中性。

4.1 李幼蒸的符号学分治思想

李幼蒸在国内的符号学活动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彼时的中国符号学还是以跟踪形式论或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李幼蒸(2007:781)说道:“我个人特别重视法国结构主义方向的努力

^① “语象叙事”有很多中译名,如艺格赋词、图说、视觉书写、书画文、造型描述等。

……对于中国符号学和中西比较符号学的发展来说,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的遗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简称《导论》)洋洋 76 万字,是集符号学史、通论、流派、专题、汇编于一身的欧美符号学“通观”。在对世界符号学理论谱系的描述中,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的介绍最细、研究最深。《导论》在“总论”中概述了当代符号学意指论和通讯论两大方向(这两大方向在本章中分别称为形式论和实体论)。李幼蒸所推出的西方现代符号学四个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皮尔斯、索绪尔、格雷马斯和艾柯)中,法国传统的索绪尔及格雷马斯具有意指论符号学色彩,美国传统的皮尔斯符号学重点考察记号和记号过程思想本身的综合性和实验主义观点,“记号过程或记号行为的通讯面研究,显著地压倒了记号的意指作用研究”(李幼蒸,2007:33)。意大利传统的艾柯符号学则具有意指论和通讯论折中主义倾向。李幼蒸强调:“在今日符号学意指论和通讯论两大方向中,本书侧重前一标准。”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两大符号学传统的对比关系中坚持索绪尔立场,是我们理解李幼蒸的符号学观点的一把钥匙(李幼蒸,2007:33)^①。

《导论》区分了语言符号学派和一般符号学派。李幼蒸认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巴特都是语言中心论的符号学。前两人的研究范围没有走出语言学,后两人已经将符号学研究扩展到非语言符号领域,但“只能说是语言符号学理论在非语言领域中的有限应用”(李幼蒸,2007:482)。一般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卡西尔、莫里斯、皮尔斯、雅各布森、西比奥克等。他们企图从记号、符号、象征、通讯、认知心理等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系统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进行描述和思考。艾柯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派。而就李幼蒸本人的立场而言,他还是着眼于各派的区别,并在这种分治中坚持索绪尔的意指论或语言中心的符号学传统。

4.2 王铭玉的中性符号学思想

所谓的分治和中性,指围绕如何看待形式与实体、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以视觉性象符为主)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符号学立场。索绪尔排斥视觉理据符号而以语言符号为中心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皮尔斯则带有非语言中心的多元论倾向,但他在处理多元异质符号的关系时还是倾向于区分而非中性化处理。因此,无论是索绪尔还是皮尔斯,他们的符号学立场还是分治的,甚至他们各自理论的底层逻辑也是对立的、非融合的,表现为形式论和实体论的二元对立。

王铭玉(2013)的代表作《现代语言符号学》于 2013 年问世。这部著作折射了中国符号学继 1993 年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出版之后 20 年间的进步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学由跟踪和展示西方符号学而转向自觉地理论建构。王铭玉也是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相互关系中探索中国符号学之路的。但李幼蒸走的是一条“分治”的道路,即坚持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两个符号学传统的对立、区别中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李幼蒸显然站在了索绪尔传统的一边。王铭玉则是“合治”的方向:二者不再是对立而是在区别基础上的依存关系,即索/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补的或“中性”的逻辑,因此要发现这种“中性”逻辑以便融合皮尔斯、索绪尔两个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符号观。

《现代语言符号学》总结了欧洲符号学家的中性思想资源:索绪尔是基于符号系统和代码的传达符号学,皮尔斯是以基于符号过程和语义作用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王铭玉,2013:9)。正是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现了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的互补特征,这就使二者失去对立而具有内在的互补逻辑,进而具有被“合治”为一个统一的

^① 李幼蒸认为皮尔斯属于通讯论符号学传统:“皮尔斯思想的一般记号观念和逻辑方向有效地排除了任何语言学的记号观念、结果、记号过程或记号行为的通讯方面研究,显著地压倒了记号的意指作用研究。”

理论体系成为可能。在此论证的基础上,王铭玉提出了自己的“合治论”的符号学定义:“关于符号系统和符号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王铭玉,2013:14)在该定义中,索绪尔形式论系统思想和皮尔斯的实体论过程思想被整合为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

在索/皮“合治”的中性符号观中,常常隐含着对下列二元范畴的关系性思考:

索绪尔传统

语言符号

系统

形式化

同质

非物质的

结构关系

二元论

皮尔斯传统

非语言符号

过程

实体化

异质

物质的

意指关系

三元论

根据王铭玉索/皮“合治”的立场,索绪尔和皮尔斯两个符号学传统分别侧重的研究范畴,被“合治观”看作是符号内在的具有逻辑关联性的两个基本属性,符号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些对比项的相互补充(非对立)关系中研究其中的每一项,反对孤立或绝对地偏向某一要素。

索绪尔传统并不拒绝对非语言符号世界的研究,但要义是坚持“以言观物”。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将符号化描述为一个无限延宕的意指过程,当作包括物体、绘画、仪式、行为等在内的一切符号之意义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本质上仍属于索绪尔的形式论符号学传统:把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机制看作是一切符号的组织原则。

而皮尔斯的符号学传统完全超出语言符号本身,而重点思考所有符号的物质性、主体性等异质要素,这就尊重每一种符号都有自己的意指法则或“语法”,如图像符号的“像似性”法则,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法则和索引符号的“因果性”法则。皮尔斯符号学传统并非不研究语言,但是以逻辑的、实体的、物的眼光观察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所以,语言中心论/非语言中心论的符号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根据它们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还是非语言,而是取决于研究方法:“以言观物”还是“以物观言”?只有将索绪尔传统和皮尔斯传统清晰地区分,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二者通约的内在逻辑。当然,王铭玉主撰的《现代语言符号学》虽具有合治论倾向,但主导立场还是语言中心论的。王铭玉避开了“以言观物”结构主义符号学路径,而是以“言/物合治的立场观言”,坚持将符号学研究对象定位在语言符号本身,以索绪尔传统为主,兼及皮尔斯传统。

4.3 赵毅衡的中性符号学思想

在21世纪“结构主义”不再是中国符号学的唯一主导,符号学正在逐步走向索/皮中性合治的发展方向,赵毅衡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赵毅衡是中国符号学界自成体系、极具原创性的学者,其近著《广义叙事学》(赵毅衡,2013),将叙事学研究延伸到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各种异质性文本:书写的、口语的、影像的、表演的、游戏的、梦幻的、实物的……体现了某种异质融合的中性立场。但从符号学本体理论的研究出发,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赵毅衡(2011)的另一代表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该书对索/皮之间做出了区分:皮尔斯并不知道索绪尔与他同时在创建另一种符号学模式,但他似乎处处有意用他的符号三元原则,对抗索绪尔的二元原则,而且明白这种对比可能导致的巨大分歧。索绪尔式的符号学走向系统观,主要原因是索绪尔的符号意义“任意

性”,二元式本身并不必然会导向封闭,例如叶尔姆斯列夫与巴特都在能指/所指二元式基础上提出过进一步衍义的梯级方式。皮尔斯的符号发展观,不仅在于符号意义三元,不仅在于用“理据性”代替任意性,更在于皮尔斯自觉强调无限衍义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符号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赵毅衡,2011:105)。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显然是将索绪尔和皮尔斯不同的符号学关键词处理为一对二元性关系项:任意性/理据性、系统性/过程性、二元论/三元论……赵毅衡对这些二元关系性的思考,必然会上升为新的更高层面的符号学理论探索,即对符号意指方式的思考。符号意指方式的性质,决定了符号结构的性质。赵毅衡强调,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导致了系统性,皮尔斯的“理据性”导致了非系统的过程性,就是从两个侧面证明了皮尔斯和索绪尔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描述了符号意指方式的两极:任意性建立在对象不在场以及与现实世界隔离的基础上,因此意义的生产必然依赖符号结构系统本身;而皮尔斯的理据性则更倚重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某种理据性关联度(如像似关系、指索关系、象征关系等),意义产生于这种不同的理据关联度及其理据化过程,因此必然淡化符号及其意义对结构系统的依赖。所以说,索绪尔和皮尔斯代表了意指定律内部的两种不同意指方式。这两极的划分还导致另一个结果:任意性原则产生的系统性是语言符号的主要特征,理据性导致的非系统性是非语言符号的主要特征,因此二者也代表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关系方式。《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指出了皮尔斯非语言中心的符号学倾向:“皮尔斯的符号学从根上就不以语言为符号范式……皮尔斯认为,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标示符号、规约符号。前两种是有理据性的符号。”(赵毅衡,2011:78)这种对任意性/理据性、系统性/非系统性、语言中心/非语言中心的二元概括和认识,显然探讨了一种新的中性符号学系统之可能。对于这种意指方式的理论探索,中国符号学家应该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国语言学家徐通锵就指出:“汉语是以理据性的约定为基础性编码原则的语言,印欧语言的基础性编码机制是无理据的约定性。”(徐通锵,2008:49)他所谓的汉语理据性是由表意汉字提供的,而拼音字母则为语言提供了一种无理据的意指方式。据此,徐通锵提出了他的“字本位”语言学理论。这得益于他对中国汉字符号传统的深刻领悟与总结,反映了他将两种意指方式“合治”为一个统一的理论范畴的系统化诉求。

一般认为,索绪尔符号学传统重点涉及有意图的符号(语言以及人工符号),皮尔斯符号学传统大量涉及无表达意图的符号(自然痕迹、无意识的表达交流行为、实物符号等等)。这两种符号构成符号学的基本论域,带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象之间、系统和反系统的二元互补性。赵毅衡力图在动机理据与结构理据之间,寻求一种动机理据主导下的二者平衡关系,这反映了他对皮尔斯和索绪尔两个传统进行中性化改造的理论立场,代表了中国符号学当下以及未来相当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走向。与王铭玉在索/皮合治中突出语言要素不同,赵毅衡在索/皮合治中较多地关注非语言符号。

5 结语:中国符号学思想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5.1 中国传统符号的中性化特征

“中性”作为“二元对立项的中间状态或消解方式”,既是一种“符号方式”,表现为符号本体的结构特性;也是一种“符号观”,表现为一种理论立场。

无论是周易符号还是汉字符号,都包含了一个执中型中性化的符号学原则:一个符号只有与其他符号边界的消失中,在相互融合、互补中才能完成自己的表达,因此产生了言、文、象通融互动的传统符号学思想。总结中国传统中性符号学思想资源,是中国符号学的重要课题。

5.2 中国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中性化趋势

中国现代符号学在经历了初创时期“极性”(二元对立)发展之后,进入了“中性”理论阶段,即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形式与实体、系统与过程、索绪尔与皮尔斯等二元对立项中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更关注它们之间“对立性解除”而产生的种种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尤其在处理索/皮两个传统的关系上,王铭玉和赵毅衡都表现出鲜明的“中性化”色彩,这代表了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当然,传统的和现代的“中性观”、不同学者的“中性观”究竟区别在那里,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5.3 重新认识索绪尔仍是中国符号学的重要课题

符号学的中性化趋势最根本的问题是消除实体与形式、系统与过程、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关系的对立,尤其是对符号物质性(实体性)的关注,例如,王铭玉和赵毅衡关于符号的定义中都认识到符号的物质性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尽管索绪尔偏向形式结构论立场,但他以及后来的叶尔姆斯列夫却将上述二元关系看作是总体语言或总体符号框架下展开的对立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索绪尔是“中性”符号观的鼻祖——他的语言和言语二分之一之外还有个中间项,即群体语言,后者包括了前两项。当索绪尔总是在“十字路口”徘徊、纠结、选择(如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形式与实体)的时候,他就是在处理中性问题。

我们认为皮尔斯不能兼容索绪尔,但索绪尔的传统却为兼容皮尔斯留下接口。重返索绪尔,重返作为中性化了的索绪尔,一个与皮尔斯建立对话间性关系的索绪尔,或者说处理好“极性”和“中性”的张力关系是中国现代符号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5.4 中西符号学理论由追踪走向对话

长期以来中国符号学处于追踪西方理论的学习阶段,如何让中西两种符号学话语展开对话,让中国传统符号学精神成为世界符号学共享的财富,同时在中西对话中建构中国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也成为中国符号学界的共识。上述三位作者也强烈意识到这一点,李幼蒸在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新版中增补了第五编,意在展开中西符号学的对话,其中“中国抽象字词的意素结构”一章,力图沟通西方符号学的逻辑语义传统和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实用语义传统”(李幼蒸,2007:747)。赵毅衡则领导他的团队开辟了“中国符号学遗产”的专题研究,将汉字符号学、《周易》符号学、名墨符号学、孔孟符号学、老庄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等纳入研究视野(唐小林等,2012)。“王铭玉说,中国关于符号的思想起源较早,如《周易·系辞传》的‘立象尽意’说,公孙龙《名实论》里的‘名正’论,《说文解字》对语言符号理据的探求,《文心雕龙》对语言符号使用主体的认识等,皆反映出朴素的符号学想……”(郝欣等,2014:17)尤其是在《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一文中,王铭玉对中国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梳理,列出13个研究领域: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佛教哲学符号学、术数符号学、典故符号学、古典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韵符号学、人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王铭玉,2016:64-65)。可以看出,一个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大潮即将到来。

5.5 由纯理论研究转向意指理论与意指实践的结合

相对而言,以李幼蒸和王铭玉为代表的语言论符号学派更关注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意指理论的探索,而赵毅衡的意义论符号学,则代表了中国符号学走向意指实践和应用的趋向。在赵毅衡的领导下,四川大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修辞语用主义和泛符号色彩的“西部学派”,诸如产业符号学(传播、广告、游戏、品牌的符号学研究)、文化与社会符号学(体育、时装、名人、民族、幸福感的符号学研究)、文学艺术

符号学(电影、诗歌、图像、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的符号学研究)等均纳入该学派的研究视野(唐小林等, 2012)。

严格讲符号学意指实践不等于符号学应用。符号学的意指实践研究包括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两大主题。文化批判主题,像法国巴特的神话学、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语境中不如文化建设主题更为主流。因此,意指实践研究中文化批判、反思一维的相对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符号学的理论原创性和应用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罗兰·巴尔特. 2010. 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M]. 张祖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高辛勇. 1997. 修辞学与文学阅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郝欣,曾江. 2014. 中国将成为新的符号学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报(2):2-17.
- 胡壮麟. 2004. 认知隐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幼蒸. 2007.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孟华. 1996. 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中西文字比较[G]//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孟华. 2021. 超符号话语及其语象关系方式[G]//语言与符号,第7辑,15-22.
- 石虎. 2002. 论字思维[G]//谢冕,吴思敬.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 唐兰. 2001. 中国文字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小林,祝东. 2012. 符号学诸领域[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王弼. 2011. 周易注[M]. 北京:中华书局.
- 王安,罗悒,程锡麟. 2019. 语象叙事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铭玉. 2013. 现代语言符号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铭玉. 2016. 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64-65.
- 王铭玉,孟华. 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J]. 当代修辞学(4):70-85.
- 徐通锵. 2008.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朱伯崑. 1993. 周易知识通览[M]. 济南:齐鲁书社.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事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Research on Neuter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 Semiotics

TIAN Muhe MENG Hu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Chinese semiotics thought”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external Chinese and Western semiotics with internal ancient and modern semiotics, then i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semiotics thought centering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neutralization”, that is, “dissolving or crossing the boundary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symbols”. It explores the spirit of the integration on language and image in the traditional symbols of Zhouyi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hen expounds the neutral posi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emiotics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signs and non-linguistic signs, thus reflecting the neutral tre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emiotics research.

Key words: Neuter; Chinese semiotics thought

责任编辑:冯革